

# 目录

总序	张 剑	ix
前言	宋 文	xviii
<b>第一章 概说</b>		<b>1</b>
<hr/>		
1.1 话题缘起		1
1.2 “现代性”概念		7
1.3 话题的当代意义		20
<b>第二章 渊源与流变</b>		<b>23</b>
<hr/>		
2.1 理性与现代性		23
2.1.1 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		24
2.1.2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理性批判		29
2.1.3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34
2.1.4 小结		37
2.2 都市现代性		38
2.2.1 都市时空转向		38
2.2.2 巴黎——现代性之都		45
2.2.3 乡村和城市叙事		49
2.2.4 大都市与精神生活		53
2.2.5 小结		55

2.3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	56
2.3.1 后现代话语思想资源：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 .....	58
2.3.2 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的主要阐释者：利奥塔 .....	61
2.3.3 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家：詹明信 .....	64
2.3.4 小结 .....	68
2.4 现代性的中国面孔 .....	68
2.4.1 抒情现代性 .....	69
2.4.2 二十世纪二十年浪漫文人群体的出现 .....	74
2.4.3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摩登都市现代性 .....	80
2.4.4 小结 .....	86

---

**第三章 经典研究例示** 87

---

3.1 现代性与日常生活 .....	87
3.1.1 列斐伏尔早期日常生活批判 .....	88
3.1.2 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 .....	92
3.1.3 “让日常生活成为一种艺术品” .....	95
3.1.4 小结 .....	100
3.2 现代性与大屠杀 .....	101
3.2.1 种族主义与现代性 .....	102
3.2.2 现代官僚体系的理性化 .....	106
3.2.3 服从之伦理 .....	110
3.2.4 小结 .....	114
3.3 现代性与性别 .....	115
3.3.1 男性气质 / 女性气质 .....	116
3.3.2 私人领域 / 公共领域 .....	121

3.3.3	大众化 / 异域崇高	127
3.3.4	小结	130
<b>第四章 原创研究例示</b>		<b>132</b>
<hr/>		
4.1	伍尔夫的女性都市空间书写	132
4.1.1	现代都市漫游者	132
4.1.2	女性都市空间建构者	138
4.1.3	现代生活体验者	143
4.1.4	小结	148
4.2	林语堂的文化现代性建构	148
4.2.1	“抒情哲学”的提出	149
4.2.2	现代国民塑造	154
4.2.3	理想生活方式的呈现	160
4.2.4	小结	166
<b>第五章 研究选题与趋势</b>		<b>168</b>
<hr/>		
5.1	现代性理论的本土化	169
5.1.1	现代性中国问题	169
5.1.2	现代性中国对策	172
5.2	现代性研究的新视角	175
5.2.1	自反性现代性	175
5.2.2	流动现代性	176
5.2.3	全球现代性	177
5.2.4	共同体	179
5.2.5	小结	182

参考文献	183
推荐文献	198
索引	200

# 前言

现代性(modernity)天然具有跨学科的庞杂特色。从时间范畴上来看,它首先标志着一种历史断裂。作为社会学概念,现代性也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宗教的衰微和世俗化的兴起,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逐步形成,城市化进程加速,由此现代社会初具规模。同时,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从一开始就承担了批判现代性的任务,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试图揭示出现代性的矛盾和危机。在心理学层面上,现代性再现了人类遭遇历史巨变的特定体验。可以说,现代化把人变成了主体,同时也把人变成了客体,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体验希望和恐惧、激进和保守、进步和倒退等种种矛盾心态。

我对现代性问题的学术思考始于对几个核心概念的诠释:现代性、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杨春时曾总结,中国现代性是外发性的,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加给中国的(杨春时:438),这也迫使中华文明在历史大变局中寻找出路。鸦片战争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叙事以现代性叙事为出发点,此外还包括现代化叙事、革命叙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叙事、中国与西方关系叙事等,这无疑涉及“启蒙与救亡”“追赶与创新”等诸多关系。

尽管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后发特点,封建主义糟粕没有彻底肃清,也因

中国受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当下中国社会环境与历史时期呈现出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步渗透、杂糅的面貌。王建疆教授将其抽象概括为三位一体的“别现代”主义(bie-modernism)，“中国正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这里既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物质基础，又有前现代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设施，还有后现代的解构思想”（王建疆：5）。因此，中国的使命是要建立别样的、真正的现代性。别现代理论或别现代主义是中国思想界、理论界面对世界发出的声音，具有多重异质同构的特点。王建疆指出，现代、后现代与前现代共时存在的哲学基础是时间的空间化。别现代的思维方式是跨越式停顿，即在事物发展到高潮时突然停顿，追求更高的境界（23）。别现代的提出旨在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建立中国式的话语场与思维场。

自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在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强力推动下，人类社会在文化、政治、经济和生态等方面都呈现出深度变化。“到20世纪初叶，中国人已强烈地意识到现代化的重要性”（罗兹曼：573）。近年来，更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不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翻版，而是创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刘儒、陈舒霄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解析为一种“大现代化观”，即在将现代化作为一种世界性进程整体考察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刘儒、陈舒霄：9）。“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这一新现代性将‘人口规模巨大’和‘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首要旨归”（14）。“‘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则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相得益彰，体现了新现代性的总体原则……将一切发展与进步统摄于中国梦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旗帜下”（14）。中国式现代化在驾驭资本逻辑中改写现代性基因，从而保证现代性的生成不被资本力量所主宰，同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新的全球现代性发展形式的酝酿”作为破解人类现代化往何处去的重要理论重构。两位学者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有“人为主体、复合

全面、多元全球”的鲜明特征，并以此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窠臼的理论超越：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确立了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观，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升为制度性、体系性的实践指导和理论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并联式发展的现代化，强调社会价值目标的多向度达成，坚持人、自然和社会协调发展（17-19）。

本书以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阶段为分期，从现代性核心概念的构成与演变开始讨论，以重要思想家的现代性研究为节点，追溯现代性研究的源流，在此基础上审视理性与现代性、都市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全面总结现代性的多元形态和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在全球化浪潮下，本书将中国纳入现代性研究中，揭示出中国在现代性命题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中国对于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此外，本书将通过现代性研究经典案例和原创案例阐明现代性研究的范式。在经典研究部分，本书通过现代性研究的经典著作，描摹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体验，论述盲从现代理性带来的极端案例——犹太大屠杀，并凸现代性的性别视角，肯定女性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以及她们对现代文明作出的独特贡献。在原创研究部分，本书关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女性都市空间书写和林语堂的文化现代性建构，实践了现代性研究的理论运用与方法创新。最后，本书概述了现代性研究的未来趋势，从而提供可能的研究选题建议，以期对研究者有所裨益。

诚如赵毅衡先生所说，“现代性”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门功课。现代性和进步观念是欧洲文化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产生现代性的土壤，相反，更强调维持历史稳定。赵毅衡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无须纠结优劣高下，也和面子无关，只需扬长避短而已，“如果现代化无可避免，学习就是；传统文化有维持稳定的价值，继承就是”（赵毅衡：2）。

最后，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教授对书稿提出的中肯建议。感谢外

研社编辑王丛琪一直以来耐心地回复我的邮件，反复确认书稿进度和体例问题。没有她的鼓励和不放弃，在拖延症之下，不知道本书何时才能最终完成。在本书的编校过程中，外研社编辑步忱纠正了我好些张冠李戴的错误，把我生生逼成了一个严谨的学者，在此表示感谢。

宋文  
南京理工大学  
2021年10月



## 1.1 话题缘起

“现代性”是一个纷繁多样的理论领域，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复杂的历史进程，本身就充满矛盾和对抗——作为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总是和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现代性首先是十六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和观念现实，其中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构成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分水岭。在十七世纪，现代性等同于理性；到了十八世纪，现代性就已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到了十九世纪，现代性等同于工业革命；而到二十世纪，人们开始反思现代性的后果。

现代性就是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是贵今薄古的创造性策略。在现代理念形成的过程中，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个人主义的种子开始萌发，最终确立了人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主张“我思故我在”，其理性主义奠定了现代主体哲学的基础。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为现代性作了一个著名论述：“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波德莱尔，1987：485）。1870年，另一位法国诗人阿蒂尔·兰波（Authur Rimbaud）发出咆哮，“绝对应该作一个现代人”（兰波：70）。二十世纪的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ălinescu）明确提出“求新意识”，强调对传统进行批判和整

合，融合异邦因素，建构一种具有世界图景的“现代意识”。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把《礼记·大学》中的“日日新”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与诗歌创新发展的动力，凸显出现代主义意象诗的“新奇”。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把现代性理解为新旧交替的成果，它谋求与过去的决裂，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哈贝马斯，2002: 178)。

现代意味着和传统的断裂，是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端和成熟。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断裂是现代制度特有的属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从新教伦理中推导出资本主义组织方式的理性化，指出这是现代性的一个关键发轫点。韦伯讨论了英国清教徒的职业观，这种职业观发端于加尔文教，认为辛勤劳动是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手段。新教中赚钱和获利的正当性被资产阶级商人挪用到世俗生活中，清教徒作为天职的勤勉劳动演变成现代工人对职业的安分守己。由此，新教伦理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了资本主义的条件——不停劳作的商人和勤勉的工人，也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育。在韦伯这里，现代性也就是社会的合理化。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诞生看作现代社会的开端，他认为以商品为核心——以商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同中世纪发生了决裂。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将一切商品化，马克思把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看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韦伯从理性出发、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论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开端和特质，福柯则坚持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来划分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前者指十六到十八世纪，后者泛指十九世纪以后。福柯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论述了现代社会同古典社会的世界观的断裂，更重要的是，他从权力角度论述了两种社会的生命管理和处置机制的断裂。现代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发明了以全景监狱和疯人院为代表的新的权力技术，从而实现对身体惩罚，亦即规训。如果说古典社会的惩罚是镇压和消灭、暴虐和压迫，现代社会的规训就是矫正和改造、产出和造就，是生产出有用而驯服的现代个体。

在制度维度上，现代性既包括资本主义，也包括工业主义。十八世纪后半期发生了英国工业革命，这对于现代性进程是决定性的。没有工业化，现代化就无法想象。韦伯和马克思都相信，工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其中，劳动力的商品化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由此来整合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吉登斯将工业主义定义为具有以下特点的制度：在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运用能源与机器；包含生产机器和人力管理的组合；制造业得到普遍推广；在生产流程的制度化过程中出现集中性的生产地点，即工厂。机器和协作是工业主义催生的最直接的两个现象。总之，工业主义的机器特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特性一起，促使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不可逆地转变。

按照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观点，工业主义还内在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形成。吉登斯也认为现代性包含着“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吉登斯、皮尔森：69）。民族主义无疑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工业社会需要流动的劳动力，社会分工需要提高技术专业能力，这种能力仰仗于基础性教育，而唯有国家才能承担和实施普及化、标准化的基础教育。对于这样一个工业主义—文化教育—国家的逻辑过程，其终点便是民族主义。现代人不再需要效忠某位君主，他要忠于的是一种文化。盖尔纳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是，“为使文化和政体一致，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盖尔纳：57—58）。

从历史角度来看，现代生活的断裂首先表现为教会影响的逐渐淡化，人们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世俗生活得到肯定；其次则表现为现代都市生活同传统的乡村民俗生活发生了断裂。前现代性根植于乡村生活和宗教生活，而现代性关照下的生活则是都市化、世俗化的。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是在十九世纪的都市巴黎中找到的，艺术家从瞬间性中发现了美；而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对柏林贸易展的描述中，揭示出普通都市人为了应对这种瞬间性和不可预见性而发明了世故、冷漠和算计，“现

代精神越来越精于算计”<sup>1</sup>(Simmel, 1950: 412)。在大都市中, 理性心理状态和货币经济形式相互强化。农业社会的沉默和稳定被打破了, 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大都市开始露出喧嚣的面容。到了成熟的资本主义时期, 一切都被商品化。按马克思的总结,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恩格斯: 254)。都市中的劳动分工使人孤立开来, 变成都市精密机器的齿轮, 都市成为一个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场所。现代性的进程引发了人的忧郁和焦虑, 令人恐惧也让人反抗,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日渐疏离。对此,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借助弗洛伊德的思想发现了都市人面对意外打击的“震惊体验”。现代主义诗人T. S. 艾略特(T. S. Eliot)则用“荒原”的隐喻来描绘伦敦这个现代大都会。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认为现代性体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冲动和现代文化两个方面。两者在构建现代性的初期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 自由和解放。然而, 它们之间迅速产生了一种敌对关系, 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追求审美感性、渴望激动的自我放纵产生了冲突(贝尔: xxiii)。卡林内斯库也指出了现代性工程中的这一历史裂变事件。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刻, 即西欧浪漫主义的勃兴时刻, 现代性分裂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代表着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 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卡林内斯库: 48); 另一种是审美现代性, 就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48), 从其浪漫主义的始源就坚持强烈的反资本主义立场, 以反叛精神、无政府主义、天启论和贵族式的自我放逐等姿态表达了其憎恶(48)。从那时起, 两种现代性就处于对立冲突之中。伍尔夫曾说, “1910年的12月, 或在此前后, 人性发生了变化”(Woolf, 1992: 70), 这一论断被一再引用, 被视作现代派小说的宣言书。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

1 文中引用部分为本书作者所译, 故参引括号内仍保留引用作品作者的原名。本书此类引用参照此做法, 不再特别说明。

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在扮演某种叛逆角色。这就是说，在西方现代性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对现代性保持警惕、不断反思的另一种思潮，对现代科技文明与理性进步观念保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现代性就是一把双刃剑，信任与风险、进步与灾难、安全与焦虑彼此共存。黑格尔(G. W. F. Hegel)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此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试图打破西方理性主义的框架，代之以生命及其意志。韦伯提出了理性铁笼的概念，指的就是一张由官僚体制化、专业化织成的网，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人对自然的过分征服。制度化的经济和政治剥夺了人的自主性，并表现为文化合理化剥夺了意义，社会合理化窒息了自由。福柯认为现代性从根本上就是一种批判的精神，他把现代性想象为古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陈嘉明, 2006: 136), 等同于“对时代进行‘批判性质询’的品格”(5)。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现代性的全面反思，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两股哲学反思的思潮：一股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为代表，他赋予现象学方法一种本体论阐释学的意义，即用对“此在”的生存“显现”根据取代了“我思”的逻辑推论，用非理性的实践关涉性取代了理性的认知构成性；另一股思潮的代表则为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他们在《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中将批判矛头指向启蒙理性，揭示出启蒙本身所隐含的自我消解、自我毁弃的倾向，即“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霍克海默、阿多诺<sup>1</sup>，“前言”：5)，该著作也因此成为二十世纪中后期欧陆思想理论界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新起点。

1979年，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发表了《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1 该引用文献又译为阿道尔诺。

*Report on Knowledge*), 自此, 作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哲学、美学、文艺批评、社会学最重要的话语事件,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争进入人们的视野, 并标志着后现代的降临。正是后现代的到来, 引发了对现代性的深度反思和对现代性道路的批判性重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人物的哈贝马斯是现代性的坚决捍卫者, 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哈贝马斯, 2011, “作者前言”: 1)。现代性受到了来自社会学话语和美学话语两方面的攻击, 而哈贝马斯要在二者的夹击中维护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找到自黑格尔以来现代性与主体理性之间不言自明的内在联系, 在主体理性的概念系统中正确表述现代性。通过“交往理性”理论, 哈贝马斯指出, 工具理性主宰下形成的资本主义科层制对生活世界进行殖民化。他从意识哲学转向语用学, 将主体视作语言交往的主体、主体间性中的主体。由此, 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取代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意识哲学的个体理性。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出现, 它对现代性的批判也从特定角度激发了人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兴趣。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了两种现代性的冲突, 一种是早期工业社会的现代性, 一种是后工业“风险社会”的现代性, 后一种现代性否决了前一种现代性。当代社会学家对现代性之弊端和灾难性后果进行了清算。阿多诺、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揭示了现代性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关联。鲍曼在后期用“流动的现性”代替了后现代性, 他借用贝克的话解释为, “现代性自己改变自己”(鲍曼, 《流动的现性》: 30)。

吉登斯看到了西方社会结构转型中的断裂性质, 指出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是全球化。他把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 而这种关系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 也把个人同大规模的系统联结起来(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56)。现代性的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上, 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吉登斯认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不足在于把现代社会的转变集中归结于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关系——资本主义。吉登斯总结了全球化的四个维度：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工业的发展。尽管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但它也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它创造了新的风险和危险，也使全球安全的可能性延伸到远方(152–153)。

## 1.2 “现代性”概念

根据后现代哲学家詹明信的说法，“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五世纪，源自拉丁语modernus，当时的学者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us)用它来表示基督教化的“现代”，和古罗马异教的“往古”形成区别，同时使得先前的古典文化有别于现代文化。詹明信指出，正是这种分界使“现代”一词形成了特定意义。借用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一书提出的现代性理论，詹明信以历史进程为依据划分了现代性的四个时期，或者说四个类型：第一个时期是“前现代时期”，对应“神学的世界”；第二个时期即西方现代性的开始时期，也就是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其突出特点为科学模式和工业生产方式；第三个时期即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这是现代历史的发明时期，也是历史主义、生机论和人文主义的发展时期；第四个时期存在于现代性的缝隙中，对自己进行否定和消解，因而无法从技术的角度将其称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詹明信的现代性概念是一个“编年史”的范畴，用于解释历史事件与历史问题。

卡林内斯库从词源上考察了“现代性”，指出这一术语从十七世纪开始在英国流行，其现代性观念源自基督教末世教义的世界观。波德莱尔从现代生活的角度定义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

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1987：485）。波德莱尔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强烈的当下时间意识，恰与永恒和不变的“过去”形成对照。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从视角主义的立场观察现代性，认为“现代性概念的流行归功于中心从经济向文化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本身尚未得到解释”（Luhmann：2），仅仅意味着现代社会自我观察、自我理解的视角发生了从物质角度向文化角度的转换。英国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吉登斯基本上将现代性看作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1）。在宽泛的意义上，现代性意指在二十世纪日益影响世界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大致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

“现代性”概念无法精确定义，人们常常把它和“现代化”概念进行比较。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代化”一词才被作为一个术语广泛采用。现代化是一种进化论的角度，涉及一系列过程。哈贝马斯对现代化的概括是：“诸如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中心权力的贯彻和民族同一性的塑造；政治参与权、城市生活方式、正规学校教育的普及；以及价值和规范的世俗化等”（Habermas：2）。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转引自程美东：4）。

另一重要概念“现代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也代指1890年到1950年间流行于欧美各国、由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转变后形成的国际文学思潮，其流派繁多，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等。彼得·盖伊（Peter Gay）指出现代主义的各个派别有两个共同的定义属性：一是对传统鉴赏品位的拒绝，并在异端的诱惑下发起行动；二是对原则性自我审查的使命感（盖伊：7）。盖伊继而提出，现代主义往往首先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的一些繁华区域兴起。工厂体系保证了大规模生产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消费；铁路创造了运输旅客和货物的手段，从此

人口分布和商业机遇经历了彻底改变；新型金融和银行帝国为一个前所未有的财富市场提供了资本。让-米歇尔·拉巴泰（Jean-Michel Rabaté）选取了1913年这一特殊年份，将现代主义置于新全球化的世界文学的广阔语境下，表现文学艺术中的“新”观念。他采用跨大西洋的比较主义和多学科研究方法，将文学艺术研究扩展到包括电影、戏剧、音乐及视觉艺术的范畴中。美国伍尔夫研究学者帕特丽夏·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在《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现代主义与中国》（*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中，通过丽莉（Lily）的“中国眼睛”，透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诗社之间的对话和交往，回顾和总结英国人认识、接受和融合中国文化的历史、途径及表现形式。她的研究强调中国、日本、印度对全球现代主义作出的贡献，说明了一种互补互利的文化交流。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性则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质性分析。现代化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现代性则是一个哲学范畴，它从哲学的高度抽象出现代社会的本质，从思想观念上把握现代社会的属性。刘小枫提出“现代学”研究，将其界定为“关于现代现象的知识学建构”（刘小枫，1998，“前言”：2）。他用三个层次来描述现代现象的研究：

从现代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结构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术语来指称它们：现代化题域——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题域——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题域——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刘小枫，1998：3）

至于现代主义，汪民安将受到现代社会猛烈撞击的文人的感慨抒情称

为现代主义(汪民安, 2012: 8)。盛宁梳理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曲折认识轨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现代主义思潮陆续被引进并开始涌动, 但是受到抗日战争等国情影响, 它被暂时搁置起来; 到六十年代, 中国的整个社会制度乃至意识形态语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现代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没落、腐朽、垂死的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的文化对应物而受到了最严厉的批评;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外国文学研究界对“极左”思潮进行清算, 现代主义才逐渐重新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和包容。《辞海》对现代主义作了比较客观准确的介绍: “反映现代西方社会中个人与社会, 个人与他人, 人与自然, 个人与自我之间的畸形的异化关系, 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情绪和虚无意识”<sup>1</sup>。杨春时探讨了现代性的内涵, 考察了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 以及现代性与文学和文学思潮的关系。他以文学思潮为基本单位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 改变了按年代排列作家作品的传统文学史编排方法。在现代性的视野下, 杨春时得出了新颖结论: “五四”文学是启蒙主义而非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加上革命现实主义构成革命古典主义; 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是启蒙主义的恢复。他同时指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未完成性。

主体性也是近代西方哲学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奠定了现代主体哲学的基础, 人们通过理性来认识自然和改变世界, 彰显主体性。笛卡尔的理性主体是自然身体和自然世界的对立面。康德(Immanuel Kant)在三大批判中通过对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批判, 进一步确立了理性主体的权威, 而主体理性是理性认知、道德实践和审美评价的原则和源泉, 理性主体凭借自我的自主、自律、自由成为文化领域的绝对立法者。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他的《什么是哲学?》(*What Is Philosophy?*)中就指出,

---

1 见“现代主义”, <<https://www.cihai.com.cn/baike/detail/72/5587730?q=%E7%8E%B0%E4%B%A3%E4%B8%BB%E4%B9%89>>(2022年6月24日读取)。

现代性的根基是笛卡尔的“我思”，以及植根于“我思”的自我反思性、自我批判的辩证逻辑、不断超越自身的动力机制等。笛卡尔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自我意识，在根本上属于以理性为核心的“意识哲学”。

黑格尔发现主体性是现代的原则。“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哈贝马斯，2011：20-21）。黑格尔在批判康德时认识到主体性原则的片面，他将主体理性提升为绝对理性，通过绝对理性将自身异化为“他者”，并在“他者”中烙下理性的无限痕迹；黑格尔以此返回了理性的辩证发展，完成了理性与“他者”的对立统一。

现代性根植于主体理性的历史之中，按照哈贝马斯等人的概括，“主体性”观念实质上是现代性的根基。当主体理性把自身客观化为工业化的机器大生产、法制化与集权化的国家体制、现代化与组织化的科层制时，人的理性主体就不得不屈从于它自己的产物而限制了其自主性、自由性与独立性。霍克海默在《论理性之蚀》（*Eclipse of Reason*）一书中指出：主体理性一旦成为工具，人也就成了手段而不再是目的。于是，由启蒙运动开始的基于主体理性来反对神话与迷信的精神要求，到头来似乎正是通过主体理性本身达到了荒谬，即反对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本身，使之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危险。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以没有成见的“自我论”去超越“唯我论”，从“唯我论的自我学”转向“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他揭示出主体理性也是一种由交互主体性构成的“主体际性的世界”。如果说胡塞尔只是在现象研究基础上提出主体间性问题，承认他人的现实存在，哈贝马斯则是吸收语言哲学成果，从对话和行动能力方面来考察并界定人的主体理性，由此，人的理性主体不再是一个仅具有认知功能的主体，而是一个包容着整个交往与活动的实践主体。正是在交往活动中，主体间性，或称交互主体性得以重建，本我和他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作用得以实现。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从人的存在的角度指出，由若干“我”结合而成的“我们”就是共同主体。

在对现代主体哲学的批判与超越中，海德格尔的独创性在于把现代的主体统治落实到形而上学的历史当中。其哲学本体论转向表明，他所探讨的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构成主体的本体基础，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把理性批判与本体论融为一体的思想。虽然海德格尔把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转换成了本体论问题，探询此在的生存论基础，但他并没有真正走出主体哲学的怪圈，他必然要依靠主体去探询、去蔽，澄明存在的意义问题。

福柯把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evi-Strauss) 提出的“否定主体的话语”视为对现代性的批判，他提出的权力主体只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运作——“我相信不存在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我对那样一种主体观持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正相反，我认为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 (福柯, 1997: 19)。哈贝马斯指出福柯鲁莽地把权力对真理的依赖颠倒为真理对权力的依赖，“然而仅仅依靠基本概念的颠倒，无人能逃出主体哲学的策略概念的牵制。福柯从主体哲学中借来权力概念，但并没有摆脱主体哲学” (Habermas: 274)。哈贝马斯从哲学的角度，将现代性视为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 (陈嘉明, 2006: 4)。

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现代品格的莫过于对自由的推崇。文艺复兴以来，个人摆脱了宗教等权威的禁锢，成为至高无上的价值中心。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 将个人自由定义为“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 (哈耶克, 1962: 19)，允许个人发展其天赋和爱好。同时世俗的幸福得到确认，包括追逐财富和张扬个性，诚如彼特拉克 (Petrarca) 所言，“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彼特拉克: 11)。哈耶克还提出有限理性论，他认为“建构的理性主义”信念是自负的，因为它对理性盲目崇拜，试图从总体上设计崭新的法律体系、制度构架和道德秩序。国家借合理的规划和道义之名膨胀，最后必定会伤害个人自由。由此，哈耶克提出“进化的理性主义”，以对理性主义的限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强调

知识不可能形成一个固定不变的总和，更不可能被个别人或个别机构完全掌握，个人既与他人竞争也要与他人合作。文明演进的成就是人的行动而非意图的产物，那种认为经由人的总体思路可以建构出一整套文明秩序的观念，是一种“荒谬的唯智主义”（哈耶克，1997：21），这样一种“社会设计理论”遭到哈耶克的猛烈批判。

自由是现代性的基本价值。作为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康德突出地论证了这一价值。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曾有名言：人生而自由。同卢梭一样，康德也把自由看作天赋人权，由“个人法权”和“公共法权”构成。前者存在的条件是“每个人自己的自由与每个别人的自由之协调一致”（康德：181），后者则是一种“现实的……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立法制度”（185）。受到卢梭契约论的影响，康德提出了国家政体应当遵循的三条原则：作为人的社会成员的自由原则，作为臣民之间的平等原则，以及作为公民的每个共同体成员的独立原则。按照此三项原则，康德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唯一合适的体制是共和制。康德的政治哲学陈述了现代社会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以自由为核心的权利，契约性的、公民平等的法制社会，代议制的共和政体”（陈嘉明，2006：65）。

自由也表现为追求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逻辑是，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发展自己的爱好，“生活应当有多种不同的试验”（密尔：66）。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多元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为个人的自由选择设定了更为广阔的空间（Berlin：167-172）。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和“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概念，其中“积极自由”指的是通过理性的自我主导、自我控制和自我实现来获得，当这个自由的主体由个人膨胀为某种超人的实体——国家或民族，“积极自由”会导致极权和专制的恶果。卢梭的“自由”观被归入“积极自由”的范畴。他用“公意”理论设想人们制定某种社会公约，每个订约者将自身的“一切权利”让渡给整个的集体，一个抽象的政治共同体；这样做的危险是，如果有人

不服从公意，社会全体会强迫其服从，从而威胁到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伯林的“消极自由”指的是个人能够保有自己的空间，保有不受阻碍和干预的自由，也就是在个人领域内不受权力干涉的自由。约翰·洛克(John Locke)代表的就是这种消极自由的传统。依照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应确保个人拥有三项基本自然权利，即“生命”“自由”和“财产”，这是神圣而不可让渡的。洛克还提出分权学说，认为国家权力由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组成，他强调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公共安全，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之手。对于洛克来说，只有保卫个人权利的疆界，使之不受权力的侵犯，才能真正保障人的自由。

韦伯将个人的崛起置于现代境况的中心，他所刻画的“祛魅”(disenchantment)过程就是摆脱制度化教会的控制与影响，走向世俗化的过程。对于韦伯来说，现代更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科学进步则是理性化进程的重要驱动力。吉登斯指出，时间—空间分离、脱域机制和反思性机制把现代性从传统中挣脱出来。中国学者张凤阳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梳理出西方现代性的三个主要取向：世俗趣味的高涨、工具理性的蔓延和个性表现的放纵。在他看来，世俗化和理性化是现代文明的两股主导潮流，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积极的共生关系。

现代首先在审美批判领域力求明确自身。著名的古代与现代之争(“古今之争”)始于十七世纪末，要求摆脱古希腊罗马艺术传统的范本，否定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权威，以进步、发展的观点证明今人超过古人。古今之争为艺术和科学的明确区分奠定了基础(克利斯特勒: 277)。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在《古今之比较》(*Paralle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中阐述了他的学科体系观念，将美的艺术从科学那里几乎完全独立出来。威廉·沃顿(William Wotton)在《古今学术回顾》(*Reflections up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中强调，从古到今科学在不断进步，而艺术没有进步。“文学依赖于想象、感情、修辞，所以今人很难超越古人；科学依赖于知识积累和正确推理，它是建立在过

去积累的全部知识之上的，所以后世不可避免地超越古代”（Wotton: 156）。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审美教育书简》（*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in a Series of Letters*）成为现代性审美批评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他用康德哲学的判断力概念来分析内部已然出现分裂的现代性，设计出一个审美乌托邦。尼采诉诸理性的他者，求助于先锋艺术，开创了现代性的美学话语。主体从日常生活的实证性经验中脱离出来，被偶然性所震惊，达到忘我的境界，沉浸于审美领域之中。在西方文化史上，用自律的审美艺术对抗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逻辑，通过诗意想象超越庸俗生活常态，呵护人的情感和灵性，乃是浪漫主义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则在美学领域持续不断地探讨现代主义的早期批判。

伴随着文化的世俗化，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城市是现代性的载体，这里汇集着波德莱尔的现代礼赞，本雅明的大都市理论，齐美尔的“精神生活”，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城市文本”，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共同体和社会。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勾勒出城乡对立的图景；韦伯的论文《论城市》（*The City*）接近城市生活系统理论，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影响。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是关于上海的文化地形图。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中早就明确说过，资产阶级现代性会迫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同时会“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255）。乔治·拉雷恩（Jorge Larraín）在《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Ide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 Modernity and the Third World Presence*）中将现代性与第三世界关联起来，“第三世界在场”被纳入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之中。从席勒、尼采、韦伯到海

德格尔、阿多诺，这些公认的深刻的现代性批判者，考虑的主要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启蒙现代性的内部问题，非西方世界的存在对现代性建构的作用根本就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 于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 标志着对这种漠视的改变。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其实是西方统治、重建、管辖东方的一种风格，是一种借助在艺术、学术、历史和哲学文本中散布地缘政治意识而建立起的西方“霸权话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哈贝马斯就把殖民地纳入其关于现代性的思考之中，马歇尔·伯曼 (Marshall Berman) 在1981年出版了研究现代性经验的经典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精彩地描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人所经历的现代性。这些都使现代性/后现代性问题之研究获得了一个新的、极为重要的维度和视野。

尽管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看作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后现代话语抓住了西方社会的新趋势和特征，宣称人类已然进入后现代时期，并将当前社会的时代精神和根本性质命名为后现代性。鲍曼认为现代没有结束，后现代也没有到来，他用流动的現代性来指称当下，其现代性具有液态性、流动性和生存的不确定性等特征，和先前强调设计、秩序、结构的固态现代性形成对照，也就是现代性之当前阶段的批判性理论。

利奥塔于1979年出版《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他将后现代性概念纳入现代性问题研究之中，构成二者之间的争论与互动阐发。利奥塔认为现代性以“宏大叙事”为标志，通过语言游戏的论争将知识审美化。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以符号消解现代性，宣称一种由拟像 (simulacra) 以及新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形式所构成的后现代性纪元业已降临。他借用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的“内爆” (implosion) 理论，论述了现代社会的“超真实” (hyperreality) 境

遇，说明拟像与真实世界之间界限的崩塌。在《完美的罪行》(*The Perfect Crime*)中，鲍德里亚透视了后现代社会的独特景观——符号与现实的关系日益疏远，模拟物取代了真实物，拟像比真实的事物更加真实——这种虚拟取代现实的严峻社会境况，变成一种“完美的罪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形成不同视角，体现出多元化态势。研究视角包括以下几种：(1) 探究和描述现代性经验，经典作品为伯曼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2) 研究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问题，经典著作为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3) 现代性社会学、政治学领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意义研究，代表著作有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和《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戴维·弗里斯比(David Frisby)的《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Fragments of 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Kracauer and Benjamin*)；(4) 现代性哲学话语研究，代表作品有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大卫·库珀(David Kolb)的《纯粹现代性批判——黑格尔、海德格尔及其以后》(*The Critique of Pure Modernity—Hegel, Heidegger, and After*)，罗伯特·皮平(Robert B. Pippin)的《作为哲学问题的现代主义——论对欧洲高雅文化的不满》(*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On the Dissatisfactions of European High Culture*)；(5) 探索现代性之动力机制和逻辑，例如匈牙利学者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的《现代性理论》(*A Theory of Modernity*)；(6) 审美现代性或现代性诗学研究，例如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Five Faces of Modernity: Modernism, Avant-Garde, Decadence,*

*Kitsch, Postmodernism*); (7) 现代性性别研究, 经典著作有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的《现代性的性别》(*The Gender of Modernity*); (8) 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性研究, 例如贝克、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合著的《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Reflexive Modernization—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其中对现代性理性主义批判得最为猛烈的包括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

中国学者的现代性研究首先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梳理, 包括启蒙学说、现代性理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等内容, 以及对马克思、韦伯、福柯、利奥塔、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专门研究。这类代表作有陈嘉明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 关注的是哲学层面上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观念演变, 从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性态度的纲领”开始, 经由尼采、海德格尔等对现代性哲学的批判, 哈贝马斯的辩护, 直至全球化背景下后现代性哲学思潮的产生。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一书的主要旨趣在于探究“现代结构”的要素与特征, 关注个体信念及其言说与知识学、社会性的关系等问题, 他吸收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思想, 指出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是人本身的转变, 是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 是所谓的“心性结构”的改变。另一方面, 刘小枫“带着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来审理欧美的社会理论”(刘小枫, 1998, “前言”: 3), 着重将中国的问题与现代性问题融合在一起, 正如他自己所言, 让汉语学界参与现代性问题的修葺(4)。同时, 他指出中国现代性的裂痕呈现为双重冲突: 不仅是传统与现代之冲突, 也是中西之冲突。金耀基要逾越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和“复古”与“西化”的二元对立, 以“现代化”的一元论取代中西二元论。他认为只有从现代化景观来审视中西文化和传统与现代的冲突论, 才是一种非情绪性的认知态度: 首先, 现代化是社会形态、文化取向和价值系统的现代转变; 其次, 现代化不仅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而且是所有社会一

致追求的目标。

其次是对当今中国现代性状况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以汪晖为代表，他先后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等重要论文，其中尤以《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反响最为热烈。汪晖力图分辨出当今中国社会所包含的各种不同成分，包括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接入全球性的市场社会而实现的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等，从而把中国社会解释为具有多种不同要素的复合体。在他看来，这种复合体是“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目标”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它构成“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汪晖：10）。汪晖提出中国现代性是“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或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命题。杨春时指出汪晖的失误“在于把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对立起来，造成了逻辑上的矛盾，更在于简单地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等同于完成现代性，忽略了二者的区别，尤其是忽略了中国的特殊国情：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错位”（杨春时，“绪论”：17-18）。

在中国现代性思想研究方面，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一部力作，它从“天理世界观”“公理世界观（科学世界观）”等概念出发，探讨了地域观念、主权意识、知识体系、现代认同等概念，以求最终达到对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理解。高瑞泉立足社会学视野，将“进步、竞争、创造、民主、科学、大同社会理想和平民化的人格理想”解读为中国的现代精神传统，认为它们是古代传统、西方思想和现代人的创造之间辩证运动的结果，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公共意识”（高瑞泉：101）。

陆扬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学术论著。日常生活审美化可视为对后现代都市生活的一种概括，即消解艺术与生活的界限、生活模仿艺术，以及消费文化将日常生活拟像化，是一种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两相结合的“布波”族趣味等。陆扬以文化研究的西学东渐和本土化努力为线索，梳理有关的西方理论资

源，并提倡在日常生活的常态中发掘艺术的潜质。

此外，译著也构成中国现代性研究的重要参考，为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源。这其中包括：汪民安等主编的《现代性基本读本》；周宪、许钧主编的商务印书馆“现代性研究译丛”，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华明翻译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赵文书翻译的贝克等的《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郭国良、徐建华翻译的鲍曼的《全球化：人类的后果》(*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阎嘉翻译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徐大建、张辑翻译的伯曼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向东、卢华萍翻译的《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刘东主编的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代表性译著有曹卫东翻译的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田禾翻译的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刘精明翻译的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杨渝东、史建华翻译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鲍曼的作品近年来被集中译介过来，包括欧阳景根翻译的《流动的现代化》(*Liquid Modernity*)、《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n Insecure World*)等。

### 1.3 话题的当代意义

自十九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国门，人们开始思考古老文明如何走向现代社会。内忧外患下，启蒙和救亡交织，中

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艰难而漫长，不时出现迂回反复。中国的现代性以晚清为起点，从一开始就被展望和制造为一种文化的“启蒙”事业。梁启超在其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多篇政论文，呼吁要完成从帝国臣民到现代国家国民的转化。他提出重要的“新民说”，以承载强国保种的重任。

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向现代性和世界主义，颂扬科学、民主，批判国民性和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的诉求被抑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一方面国家面临着日本的侵略，“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2008：21）；另一方面左翼文化界接受了苏俄传来的马列主义，阶级意识和新的国家主义开始盛行。中国共产党以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取得了革命胜利，初步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杨春时：15）。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时期延续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主张更积极地向现代西方世界开放，吸取西方人文思想资源，争取现代性的实现，这种思潮被称为新启蒙主义。

大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再次成为中国理论界的热点。究其原因，正如陈嘉明所分析的，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转型，人们相应地开始关注现代性的思维理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更多学者认为我们已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沈江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包含红色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外部有益文化三种文化传统，并强调应依托中国实践，“不断地对三种文化传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与融合，赋予其新的内涵，着力推动中国话语体系的创新性发展，努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沈江平：19）。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也可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与发展经验（19）。

国外的现代性研究偏重于西方视角。对于由西方发动的现代性进程来说，所有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都是“迟到的民族”。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现代性研究大家都是男性，缺乏一种性别关照。“第三世界在场”以及诸

如中国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現代性經驗研究剛剛起步，僅僅表現為研究視野的拓展，暫未產出強有力的研究著述。就中國目前的狀況來看，國內的現代性研究譯介充分，理論建樹不足。當前社會的內在文化精神從根本上還處在遠離現代性的“前現代”情境中，前現代的經驗性和人情化文化模式在許多方面依舊影響深遠。陳嘉明指出，當今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普遍缺陷是局限於現象層面的描述，而不能上升為概念層面的把握，“時下的中國只有‘哲學家’（在不同程度上了解西方的哲學思想），而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未能具有自己原創的哲學思想體系）”（陳嘉明，2009：76）。牛宏寶認為，“‘西方化’、‘文化原教旨主義’和身份缺失及其重構，構成了非西方區域現代性文化經驗的三副面孔”（牛宏寶，2007：108）。

在全球化語境下，非西方國家和區域的現代性經驗研究才剛剛開始。本書力圖引入中國視角，帶著中國問題，跨學科、多角度地論述西方現代性理論，呈現多元化的現代性形態。本書也力圖勾勒一個從鄉土中國向都市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中国，描繪它如何面向世界，回應西方，展現中國智慧。本書還將進一步考察中國特定社群的意識結構或心理結構，思考如何在現代性經驗共同體中，構築當代中國人共同的民族記憶和想象，重振民族文化自信，最終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同世界理想。誠如李歐梵所說，中國文學書寫必須具有國際視野，內核表現中國民間的東西，用歐洲現代主義敘事呈現方式在世界舞臺上傳播和提升中國形象。

在中國，現代性無疑還是個問題。而在率先遭遇現代性的西方世界，現代性也依舊是個難題。